

## 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

楊 瑞 松\*

###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四萬萬人」如何在近代中國從一個人口數字，漸次演化成爲近代中國的國族符號的歷史過程及其意義。經由晚清時期的維新思想的運用，尤其是康有爲和梁啓超二者論述的催生下，此「數字化」的描述晚清中國人口的方式，配合所謂「同胞」的血緣親屬想像符號，形塑出具有高度同質性意涵的國族認同。「四萬萬」人口符號同時也標示中國作爲國族國家，脫離傳統天下秩序的新世界觀的重要轉變。但另一方面，爲了強烈激發國族意識，四萬萬的國族想像也經常以全盤負面形象如「四萬萬禽獸」的意象出現。最後，本文也檢討此種人口想像模式和其他近代中國人口想像意象，例如「一盤散沙」、「五族共和」等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潛在緊張性。不斷出現在近代中國語境的「四萬萬人」符號，不僅扮演如 B. Anderson 所描述的限定國族國家邊界意識的重要角色，更是長期以來已經很「自然」地嵌入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中。藉由去自然化此現象和歷史化此符號，詳細地分析比較各類有關運用「四萬萬」符號的文本，本研究試圖更清楚地解析「四萬萬人」符號產生的歷史過程，以及發揮了哪些想像的力量從而形塑了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的特定風貌。

關鍵詞：四萬萬人、同胞、散沙、五族、梁啓超

---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s” Discourse/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in Modern China**

Yang Jui-sung

### Abstract

My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of how the term “Four Hundred Millions,” originally a plain description of the Qing popul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widely utilized by many people as a national symbol of modern China. Thanks to the late Qing reform thinking, especially the discourses of Kang Yowei and Liang Qichao, the “digitalized” way of depic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Qing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use of the term “Compatriot,” came to shape a highly homogeneous national identity of modern China. This symbol also indicates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of China transforming into a nation-state from a traditional empire.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ymbol has also been constantly appropriated to construct negative national identities, such as “Four Hundred Million Animals,” in order to shame China into becoming a true nation. And since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s” discourse is also often paralleled to other famous collective images/symbols, such as “a heap of loose sand” and “republic of five peoples,” my study has

tried to reflect 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nd tension between these symbols as well. The symbolic power of “Four Hundred Millions” not only performs the function of sett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 against other nations, a function that has been analyzed by B. Anderson, but also has become “naturally” embedded in the banal nationalism of modern China. By “denaturalizing” this phenomenon and historicizing this symbol by means of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painstakingly a variety of texts which utilize this symbol, my study has tried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power of “Four-Hundred Mill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Keywords: Four Hundred Millions, Compatriots, Loose Sand, Five Peoples, Liang Qichao

airiti

## 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像\*

楊 瑞 松

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sup>1</sup>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sup>2</sup>

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sup>3</sup>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100-2410-H-004-219）的研究成果。初稿曾在2011年間分別發表於政治大學頂尖大學計畫「形塑現代中國日常生活」的工作坊，以及「災難／國族／影像：東亞跨國現代性」的國際會議上，並因而得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教授和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李朝津教授的諸多寶貴指正。本集刊幾位匿名審查委員非常仔細地閱讀本文的初稿，同時也提出了許多中肯批評和相當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因為有諸位先進的幫忙，本文方能得以有較完善的面貌闡述其核心論點。我謹在此一併向他們表達最誠懇的謝意。

<sup>1</sup> 譚嗣同：〈有感一章〉，收於李敖主編：《譚嗣同全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3年），頁492。

<sup>2</sup> 梁啟超：〈新史學〉，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冊，頁739。

<sup>3</sup>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收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冊，頁3。

## 一、從「新名詞」到關鍵詞

從民國41年（1952）到78年（1989）長達近乎40年的期間，在臺灣的小學三年級教科書中，收錄著一則有關「蔣總統愛國反日」的歷史小故事。故事內容大致如下：

蔣總統從小就很勇敢，又很愛國。所以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進了陸軍學校，預備將來保護國家。蔣總統在陸軍學校求學的時候，有一天，有一個教衛生學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塊泥土，放在桌子上，對學生說：「這一塊泥土裡面，有四萬萬個微生蟲。」這句話引起了蔣總統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說：「這塊泥土，好比中國。中國有四萬萬人，好像是四萬萬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塊泥土裡一樣。」蔣總統聽了，非常氣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塊泥土分成八塊，然後向日本教官說：「日本有五千萬人，是不是也像五千萬個微生蟲一樣，寄生在這一小塊泥土裡呢？」日本教官沒有想到中國學生裡面，會有這樣勇敢愛國的青年。一時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sup>4</sup>

這個故事的原始版本出現於毛思誠（1873-1939）在1937年所著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sup>5</sup>並且也收錄於由總政戰主任王昇（1917-2006）所編的《我們的蔣總統》<sup>6</sup>一書中。當然，各類有關蔣總統生平介紹的書籍，包含日本人古屋奎二在1970年代所編寫的《蔣

<sup>4</sup> 〈愛國的蔣總統〉，收於國立編譯館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初級》修訂暫用本（臺北：國立編譯館，1956年），第5冊第28課，頁72-73。

<sup>5</sup> 毛思誠編、陳布雷校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收於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87冊，頁20-21。

<sup>6</sup> 王昇：《我們的蔣總統》（臺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6年），頁18。

總統密錄》，<sup>7</sup>也都收錄了此則故事。<sup>8</sup>對於一般大眾而言，由於這個故事出現在小學教科書的期間如此久遠，可以說成長於戒嚴時期之幾個世代的臺灣人，應該都對於此圖文並茂的故事有深刻印象！

本研究無意去探討此歷史故事的真偽，而是引用此流傳性甚廣的故事以彰顯所謂「中國有四萬萬人」的說法和意象，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所扮演的鮮明角色。在上述故事中，當日本教官以四萬萬之眾描繪中國的集體人口，並將其醜化為四萬萬的寄生蟲時，不管是年輕的蔣介石（在1906年）或者是閱讀此故事的臺灣青年學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都「很自然」地立即明瞭他是針對中國人的集體形象加以羞辱。換言之，從二十世紀初期以降，「四萬萬」的全中國人口數字早已經深入人心，以「四萬萬人」、「四萬萬之眾」、「四萬萬同胞」或「四萬萬中國人」等表述方式，出現在各類型有關於近代中國意象的文本；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更是成為近代中國人在界定想像「我族共同體」的人口疆界的代表性數字和符號。

但是，如果我們以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的角度來解析此人口數字，我們將會發現其符號形成的複雜歷史性以及其曖昧性。首先，對於當代的中國人而言，或許中國有「四萬萬人」的說法，是極其自然而且馬上能夠意會的描述，可是在十九世紀末時，這樣的說法都還是極其新鮮，甚至被部分人士視為荒誕不經的表述方式。例如在晚清反維新派的論著中，收錄於1899年出版的《翼教叢編》的〈湘省學約〉，即是將「四萬萬人」和「熱力」、「支那」、「乙太」、「黃種」等字眼，並列為「搖筆即來，或者好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造成閱讀者「閱不終篇，令人氣逆」的現象。<sup>9</sup>由此可見，「四萬萬人」在現今的中文語境中可謂是大眾耳熟能詳，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況，在一百

<sup>7</sup> 古屋奎二：《蔣總統密錄》（臺北：中央日報，1974年），頁48-49。

<sup>8</sup> 有關此故事的傳播簡史，參見張肇祥：〈塑造與傳播：愛國反日的蔣介石同學〉，《國立板橋高中學報》第5期（2006年5月），頁175-183。

<sup>9</sup> 蘇輿編：《翼教叢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318。

多年前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其次，從「四萬萬人」的單純字面上意義而言，它原先不過就是一個人口數量的表述符號；但是從晚清時期以降，它卻漸次演變成爲一個鮮明的國族符號，成爲一個強調彼此命運相結、休戚與共的國族共同體的代號。在傳統中國政治論述中，往往以「蒼生百姓」、「黎民黔首」、「天下臣民」等廣泛性字眼描述帝國體系下的被統治人民；相對而言，「四萬萬人」符號以明確的數字取代了上述泛約性字眼，從而以實際的數目劃定了在十九世紀以降在國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新世界體系中近代中國國族的人口疆界。<sup>10</sup> 更重要的是，「四萬萬人」和其衍生的字眼等符號，不斷出現在晚清時期強調唯有萬眾一心，全民總動員才能和世界其他各國競存之的「合群」論述中。這些名詞（尤其是「四萬萬同胞」）更是在晚清國族主義論述的挪用下，成爲欲化四萬萬被統治之「臣民」，爲四萬萬具有參政自覺意識之「國民」的思想論述中，召喚每一個成員成爲國家的主體，並產生與國家興亡榮辱與共之認同情感的重要符號。<sup>11</sup> 簡言之，「四萬萬人」從原本不過是描述晚清帝國統治下的人口數字，最終轉而爲國族建構論述中具有兄弟之愛、榮辱與共的共同體意涵之國族代號。本文的開端所引述的譚嗣同（1865-1898）詩作中的「四萬萬人齊下淚」意象，即很明顯地展示出此種共同體想像的符號性質的情感訴求——清帝國甲午敗戰的後果，不再只是一家一姓的清王室或是清政府所面對的政治困境，而是所有四萬萬的國族成員理應感同身受的集體恥辱。

誠如 Michael Billing 所指出，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形塑過

<sup>10</sup> 有關十九世紀清中國從天下體系變化至萬國體系的思想史宏觀脈絡討論，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2006年4月），頁40-53。

<sup>11</sup> 有關晚清以降「國民」意識的形塑，以及近代中國國民論述始終呈現「國權」高於「民權」的現象分析，參見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685-734。



程的一個重要關鍵議題，正是作為國族的「我們」(the national “we”)是如何被建構而成，而這個被建構的「我們」又被賦予何種意義。<sup>12</sup> 本研究所欲探討分析的主題即是與「四萬萬」相關的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立基於「四萬萬」符號的中國國族認同因而具有哪些特色。我將檢視「四萬萬人」想像論述發展的來龍去脈，檢視它如何如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不再僅是討論人口、稅戶等財政經濟議題時才會出現的有關人口的字眼，而是伴隨著方興未艾的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和國族想像論述發展，成為界定中國從過往專制君主的「天朝中心體系」，轉化為以「四萬萬人」為主人翁的「萬國中之一國」之重要國族符號。換言之，「四萬萬人」從一個有關清帝國統治下人口的粗估數字，在晚清時期尚被保守派人士視為是「幽渺怪僻」之新名詞，卻漸次演化為近代中國國族想像論述中的關鍵詞，代表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訴求的符號，更時常和正面或反面的集體意象連結，扮演召喚群體意識、激發共同情感、鼓吹國族認同的重要角色之複雜歷史變化過程的解析乃是本研究的主題。同時我也將探討此「數字化」的國族共同體想像模式，如何配合所謂「同胞」之血緣親屬想像符號，來連結形塑近代中國國族的高度同質性，我們將會發現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的想像中，新舊因素的混同與挪用的現象。最後，我也將以上述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於「四萬萬」的國族想像和其他近代中國集體想像意象，例如「一盤散沙」、「五族共和」等，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潛在緊張性做一些嘗試性的探討。

## 二、從人口數字到國族符號

「四萬萬人」作為對於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末時所統治人口數量的描述有其一定的歷史依據，誠如薛福成（1838-1894）在1891年間所言：

---

<sup>12</sup> Michael Billin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70-74.

今天下諸國人民之眾，中國第一，英國第二，俄國第三，中國人數在四萬萬以外，大約四倍於英，五倍於俄；余因攷二千年來，以漢平帝、元世祖、明神宗為戶口最盛之世，然戶多不逾一千二三百萬，口多不過六千萬以內而已。國朝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民數三萬七百四十六萬有奇，較之康熙年間，已增十三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除臺灣未報外，共得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餘人，則閱時未六十年，又增一萬一千九百餘萬人矣。自粵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人數幾耗一萬萬有奇，迄今蕩定之後，又已休養二十餘年，戶口頗復道光季年之盛。<sup>13</sup>

從引文中可見，薛福成認為他當時所處的十九世紀末時清帝國所統治的人口數量，應和道光年間的人口統計最高數目（四億二千六百七十三萬餘人）相若，這是他以其間的戰亂和人口成長趨勢兩項正負因素所相互抵消後的估算結果。而薛福成也依據此估算的人口數（四萬萬以外）將中國和其他世界各國相比較，強調中國乃是世界人口數量為首的國家。梁啟超（1873-1929）在其於1902年所著的〈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一文中，也提及「西人之稱我者，動曰四百八兆，此道光二十二年料民之數也」，同樣地提及道光年間的數據為四百餘兆的流行說法之歷史淵源。<sup>14</sup>事實上，林則徐（1785-1850）於1838年時論及鴉片所造成的經濟財政禍害的文章中，也確切提到道光年間人口總數逾四萬萬。林則徐以吸食鴉片每人每年需費銀三十六兩，而做出如下的估算：「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裁，不止於四萬萬

<sup>13</sup> 薛福成：〈許巴西墨西哥立約〉，《庸庵文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1，頁187。

<sup>14</sup> 梁啟超：〈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冊，頁905。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本人在此雖以「吾中國官牘上文字，多不足措信」，對此人口數字質疑，在其眾多論述中卻也均還是以「四萬萬」之數談論中國人口數或意象。

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一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即不止於萬萬兩」。<sup>15</sup>

由上述例證可見，就人口統計數字而言，「四萬萬人」並非一項在晚清時期所無中生有而發明之術語，而是依據道光年間的人口總數所推算出的數字，在晚清時期的論述中已有相當程度的流通性。王韜（1828-1897）在其1883年所寫的〈歐洲各都民數〉一文中，也言及中國總人口為四百餘兆（亦即四萬萬多）冠於全世界的現象，並且強調中國富強之道正在於要能善用其眾：

四大洲中，林林總總，當不知其凡幾，而歐洲不過二百數十兆，中國一國則得四百餘兆，然則生齒之繁，莫如中國。以中國一國之人數，已可抵歐羅巴一洲而有餘，豈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國而計之，版圖戶口亦以中國為巨擘。俄羅斯方七十二兆裡，戶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裡，戶口二百零九兆。合眾國方三十兆裡，戶口三十二兆。中國方五十兆裡，戶口四百兆。是則天下諸邦人民之眾，無有出於中國上者。願有眾尤貴能善用其眾，則富強之術、保衛之方，可不亟講也哉。<sup>16</sup>

從薛福成和王韜的論述脈絡也可以看出，此四萬萬人口數字已成為晚清有識之士作為界定清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相比較時的一項重要數據。而一般論者為求論述上方便起見，往往取其整數（四萬萬）以言之，例如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1892年所著的〈紡織機器圖說〉一文中，提到中國的人口數即是如此表述：「於二萬萬人設每人年需棉花中數三磅，則一年共用應六萬萬磅；又如中國有四

<sup>15</sup> 林則徐：〈重禁吸煙以杜弊源〉，收於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卷85，頁2175。

<sup>16</sup> 王韜：〈歐洲各都民數〉，收於楚流等選注：《弢園文錄外編——王韜集》（瀋陽：遼寧出版社，1994年），頁143。

萬萬人，則一年應共用棉花十二萬萬磅，可見中華產棉既多、用棉亦眾。」<sup>17</sup> 另外從 1861 年起即在中國長期傳教的英國傳教士慕雅德 (Arthur Evans Moule, 1836-1918)，更是直接以 “Four Hundred Millions” 「四萬萬人」作為他在 1871 年所出版的有關介紹中國和中國人之專書的主標題。<sup>18</sup> (上述王韜〈歐洲各都民數〉一文中即是先言及中國人口有「四百餘兆」，但在文後也就是以中國有「戶口四百兆」的整數來和歐洲各國人口數相比較)。

另一方面，誠如梁啟超在上文提及的情況，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西方人有關中國的描述中，的確不乏以 “400 millions” 為基礎來界定中國的人口數，例如在 1896 年刊行於英國泰晤士報 (*The Times*) 的有關中國稅收和資源的一篇文章，即以類似上述薛福成的估算法，認為中國人口在當時約有道光年間所達到四萬萬人 (After 1835 the population always topped four hundred millions. The Great Rebellion may have halved it, but it has since recovered much lost ground.)。<sup>19</sup> 此外，曾經在晚清時期風靡中國知識界之「中國人種西來說」的作者，亦即知名法國學者 A.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 即在其 1880 年間所刊行的演講稿中，推估中國的人口數為 “400 to 420 millions” 之間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pproximate calculations on which it is based are erroneous, but, after all, we are forced to admit a total varying from 400 to 420 millions of human beings.)。<sup>20</sup>

從以上例證可以看出，雖然嚴格而言，以四萬萬人來界定清帝國

<sup>17</sup> 傅蘭雅：〈紡織機器圖說〉，收於孔慶和、王冬立、張宇澄等編：《格致彙編》(南京：南京古舊書店，1992 年)，第 6 冊，頁 89。

<sup>18</sup> Arthur Evans Moule, *Four Hundred Millions: Chapters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London: Seeley, Jackson, & Halliday, 1871).

<sup>19</sup> E. H. Parker, “The Revenue And Resources Of China,” *The Times*, Issue 34994 (September 1896): 12.

<sup>20</sup> A. Terrien de Lacouperie,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 Early History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28 (1879: Nov. 21-1880: Nov. 12): 725-734. 引文見 725.

的人口總數只能說是一種推估而且不精確的說法，但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外論述中，這樣的說法都有其普遍性。<sup>21</sup> 可是如果此一數字僅止於是論及當時中國人口數量所偶而運用之字眼，而且它的由來本身又有一定的中國傳統歷史依據，它應當不致於引發如前述〈湘省學約〉中所呈現的強烈反感情緒。它之所以成爲保守派人士眼中的「幽渺怪僻之言」，恐怕正在於從十九世紀末期，尤其是1890年之後，諸多倡導革新變法的政治論述（即使其論述主旨並非著眼於人口稅收等議題）中，即經常引用「四萬萬人」及其衍生的「四萬萬之眾／四萬萬同胞」等符號於其中。更有甚者，如同前述所引用的《革命軍》所顯現，此「四萬萬」字眼也不斷地出現於反滿革命的文宣中。

的確，被〈湘省學約〉作者斥爲當時傳播異端邪說的代表人物之康有爲（1858-1927）和梁啓超師徒二人，對於「四萬萬人」一詞的運用在晚清以降蔚爲流行的現象具有重要推手的角色。以康有爲而言，在其1888年所著的〈上清帝第一書〉中，即以「地方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眾，物產二十六萬種之多」的陳述向光緒皇帝（1871-1908）強調清中國乃是一個廣土眾民之國的現況。<sup>22</sup> 之後康有爲在他一系列上書皇帝的論述中，也一再運用「四萬萬之民」、<sup>23</sup>

<sup>21</sup> 除了本文中提及薛福成認爲此數字的歷史依據爲道光二十八年的人口數字等說法外，據葛劍雄的研究，它可能的依據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的官方統計數字，但是之後在歷經太平天國戰亂後，在1852年時官方的數字降成3.3億。而且自此之後到清結束，均沒有再有實際調查的數字出現。葛劍雄等著：《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一八五零年以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52。著名的在華傳教士 Arthur Smith（明恩溥），在其名著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年初版），論及有關中國人口數時，也一再強調沒有可靠的科學數據來論斷當時的中國總人口數。他最後以兩億五千萬人作爲其保守的估計，見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walk: EastBridge, 2002), 145.

<sup>22</sup> 康有爲：〈上清帝第一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56。

<sup>23</sup> 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冊，頁116。

「民籍四萬萬」、<sup>24</sup>「人民四萬萬之多」、<sup>25</sup>「四萬萬淑秀之民」、<sup>26</sup>「四萬萬人」<sup>27</sup>等語詞突顯清中國面對列國競爭的國際局勢時所具有的人口數量上優勢。例如他認為「夫以歐洲十六國，合其人數，僅二萬萬，我乃倍之，以二千萬練兵，加數百艘之鐵艦，揚威海外，誰能禦之？」<sup>28</sup>他並且以日本作為對照，認為其「人民土地不能當中國之十一」，但卻能勇於變法而能達到富強之境，相形之下「中國地方二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眾，物產二十六萬種之多，……此地球各國之所無，而泰西諸國之所羨慕者也」，若能立志變法革新，則必定能超越日本的成效。<sup>29</sup>他力陳清朝廷不以變法以鼓舞民氣乃是「有四萬萬之民，而不善用之也」的說法，也正和上述王韜所強調的「善用其眾」若合符節。<sup>30</sup>

雖然在這些〈上清帝書〉中，康有為一再強調皇帝應善加運用作為一種強大的豐富人力資源之「四萬萬人」，但是康有為同時也提醒皇帝應留意如何促使四萬萬人萬眾一心團結合作，並達成君民同體休戚與共的局面。在其〈上清帝第二書〉（亦即著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除了一再提及「四萬萬人」外，並提醒光緒皇帝：

皇上舉此經義，行此曠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紓

<sup>24</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43。

<sup>25</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53。

<sup>26</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02。

<sup>27</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219。

<sup>28</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60。

<sup>29</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53。

<sup>30</sup>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116。

財，共贊富強，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以之籌餉，何餉不籌？以之練兵，何兵不練？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爲心，天下莫強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講鐵艦之精，而海可以戰。於以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耀我威稜。<sup>31</sup>

所謂「中國一家，休戚與共」、「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爲心」的君民同體萬眾一心的「合群」主張，事實上可謂是晚清維新思想的一個普遍關懷。康有爲在〈上清帝書〉中所抱持的態度，似乎樂觀地認爲如果皇上能夠登高一呼，則四萬萬人團結合群的局面也能水到渠成，進而使清中國稱霸世界。同樣地，陳熾（1855-1900）在1894年所著之〈保甲〉一文中也運用「四萬萬人」的符號來論辯合群的重要性，他也樂觀地認爲「君臣一德，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中國四萬萬人之精神才力，共圖一自強之策，雖并吞四海無難也，而何畏乎英俄？何憂乎船炮？」<sup>32</sup>有趣的是，鄭觀應（1842-1922）在同年間有關議院（議會）制度的討論中，也運用幾乎相同的論調和語彙，認爲以代議制方能使下情上達得到合群之效：「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立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人之眾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sup>33</sup>

可是要促使四萬萬人合群合力並且達成富國強兵之目的，在晚清的現實情境終究未能出現有如上述諸論述所描述的樂觀情景。相反地，晚清帝國面臨的內外困境，不時令有識之士有「恨鐵不成鋼」之嘆。鄭觀應在1893年間討論禮儀問題時即感嘆：「嗚呼！此我中國上下四萬萬人群相見以僞，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sup>34</sup>而在歷經清中國

<sup>31</sup> 康有爲：〈上清帝第二書〉，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冊，頁135。

<sup>32</sup> 陳熾：〈保甲〉，收於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店，1997年），頁71。

<sup>33</sup> 鄭觀應：〈議院上〉，《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23。

<sup>34</sup> 鄭觀應：〈典禮上〉，《盛世危言》，頁149。

的甲午慘敗後，這種強烈抨擊全國上下皆偽的怨憤之情，也在曾經相信清中國能夠復興而無畏於英俄的陳熾的著作中表露無遺。陳熾在1897年以「瑤林館主」之名發表於《時務報》的〈貴私貴虛論〉中，描述了清中國的現況為「上之視下也如土芥，下之視上也如寇讎。浸至盈天下四萬萬人各懷其私、各行其私、各是其私，而中國四萬萬私人遂成四萬萬私國，任聽他人欺凌狎侮、鞭笞捶扑而俯首帖耳無可如何矣！」<sup>35</sup> 陳熾甚至悲觀地在其結語中認為中國當時已因全國上下相欺瞞而陷入危險之境：「嗟呼，中國地大物博人稠，君民上下以虛相蒙，以私相遁，至於此極。而忽有他人以甚公之政治法律出而臨之，以甚實之精兵利械入而摧之，危乎！危乎！」<sup>36</sup> 這種「四萬萬私人成爲四萬萬私國」的情況，更是導致中國在梁啓超筆下成爲「無國」的狀態：「以故爲民四萬萬，則爲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sup>37</sup>

從以上的論述例證我們可以看出，「四萬萬人」在晚清時期，特別是在1890年後的維新派思想論述中，已是經常被援引的符號用來形容界定清中國和其他各國相較下所具有的眾多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和特色。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論述也通常表露出一種不知如何才能真正團結此「四萬萬之眾」，進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焦慮。特別是在歷經甲午敗戰之後，許多悲痛失望之情溢於言表，難掩對於空有「地方二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眾」清中國，卻淪爲列強所恣意欺凌之局面的不解和痛心。梁啓超在其1898年間所著之《戊戌政變記》中，所述之境可謂一語道盡當時許多憂國憂民者的心聲：「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sup>38</sup>

<sup>35</sup> 陳熾：〈貴私貴虛論〉，收於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頁315。

<sup>36</sup> 陳熾：〈貴私貴虛論〉，收於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頁317。

<sup>37</sup> 梁啓超：〈說群·序〉，收於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1冊，頁93。

<sup>38</sup>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收於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1



在這一片苦思清帝國如何復興自強，四萬萬人何去何從的各類論述中，如何真正能團結四萬萬之眾，發揮其潛在的集體力量的思維中，除了上述一再被強調的為政者應善用「四萬萬人」的力量，以及主張君民上下應真誠以對的合群論述外，一種主張四萬萬之人應該具有「共享國權」的可謂現代國民意識之論述也開始浮現。而反維新派人士之所以對於「四萬萬人」一詞極度反感，除了因為它是上述維新派思想論述中經常引用的字眼外，恐怕主要正是因為「四萬萬人」的符號也時常出現在主張設議院（例如前述的鄭觀應的論點）和其他宣揚「民權」的論述中。<sup>39</sup> 例如唐才常在論及如何能使全中國之人均成為「恥國恥，事國事，權國權」的為國奔走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仁人志士的文章中，即明言：「夫吾中國以四萬萬人而國者也，吾既為四萬萬人中之一人，則剖國權為四萬萬分，吾即有其一分，而可以撐拄之維持之，寧復有鹿挺而走、魚爛而亡者？」<sup>40</sup> 這種強調由全國四萬萬人分享國權才能保國的思想，在康有為於百日維新期間的奏摺〈請君合治滿漢不分折〉之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制主張中更是表露無疑。康有為在此奏摺中承繼他在〈公車上書〉的君民合心合體之思想，更進一步指出西方各國和日本能夠達到君民合心合體，正在於「立憲法以同受其治，有國會以會其議，有司法以保護其民，有責任政府以推行其政」<sup>41</sup> 的制度使然，他因此力主清光緒皇帝：

若聖意既定，立裁滿漢之名，行同名之實，則所以考定立憲國

---

冊，頁217。何啓（1859-1914）和胡禮垣（1847-1916）在同年間也有類似的描述：「今者中國四萬萬人，如居覆屋，如在漏舟，如作犬羊，如為奴隸，衰敗之狀，古所罕聞，參見張岱年主編：《新政真詮：何啓、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48。

<sup>39</sup> 有關反維新派人士對於「民權、君主立憲、議院」等維新主張的討論，參見楊菁：〈導言〉，收於蘇輿編：《翼教叢編》，頁1-52。

<sup>40</sup> 唐才常：〈熱力〉，收於鄭大華等選注：《貶舊危言——唐才常宋恕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3-111，引文參見頁108、109。

<sup>41</sup> 康有為：〈請君合治滿漢不分折〉，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340。

會之法，三權鼎立之義，凡司法獨立，責任政府之例，議院選舉之法，各國通例具存，但命議官遍採而慎擇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合舉國四萬萬人之身爲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爲一心，其誰與吾敵，而豈復四顧徬徨，膽畏鄰敵哉？<sup>42</sup>

在晚清維新變法的思想界中，這種不再僅以強調四萬萬人是君主所應善用的廣大人力資源，而是轉而關注四萬萬人必需成爲具有自覺意識的國民，進而共同承擔國家興亡責任的新思維之靈魂人物乃是梁啓超。坊間關於梁啓超對於「現代國民」意識形塑的思想貢獻已有不少深入的研究，可是論者所未深究者，乃是梁啓超在推動關於「國民」的新思維的同時，其實也是對於「四萬萬人」成爲近代中國國族的代表符號的歷史轉折具有關鍵性之角色。<sup>43</sup>如同其他維新思想家一樣，梁啓超在其著作中也經常使用「四萬萬人」符號來描述中國的人口總數現狀，或是運用此符號在強調合群的重要性之論述上。例如在《戊戌政變記》中，除了上述所引述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在覆屋之下」的描述外，梁啓超也多處運用如「做貳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東海不得，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將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果能合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爲者」、「嗟夫！吾中國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之日蓋已久矣！」等等和當時可謂已是老生常談的有關運用「四萬萬人」符號表達的類似論述。<sup>44</sup>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作品中他也開始運用了他所創發的「四萬萬同胞」來描述他

<sup>42</sup> 康有爲：〈請君合治滿漢不分折〉，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冊，頁342。

<sup>43</sup> 有關晚清國民思想的研究，可參見：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M.E. Sharpe, 1997)；沈松喬：〈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685-734；關於梁啓超國民思想的研究，參見張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頁1-66。

<sup>44</sup>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收於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1冊，頁218、219、249。

心目中的中國國民：「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為溫和焉，而我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為奴隸，終莫可救矣。」<sup>45</sup>

從目前所掌握的歷史文獻推斷，梁啟超極可能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明確以「四萬萬同胞」一詞來描述他一心所欲召喚的具有現代國民意識的中國國族，並大量運用此一新字眼在他的諸多著作之中。梁啟超最初曾在1896年間所著之〈變法通議〉一文，在論及滿漢應合作變法圖強以共同抵抗外敵時，他一度使用「四百兆同胞」一詞如下：「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sup>46</sup>但是他當時並未對此字眼再多所著墨，在之後約兩年間的時間中，他的著作中也未曾再出現此一字眼。直到1898年底，在歷經戊戌政變的挫敗後，梁啟超對於中國改革圖強的希望開始轉向到如何將「臣民」轉化為「國民」的努力上。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梁啟超重拾他先前運用過的「四百兆同胞」，並將它稍加修改為「四萬萬同胞」，之後開始大量運用此符號於其著作中。在1898年底所撰之〈《清議報》敘例〉一文中，梁啟超誓言「聯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並以感性的語句召喚「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sup>47</sup>在此處梁啟超明確地將「四萬萬同胞」符號和他當時從日本思想界借來的觀念「國民」相連結；而在中國國境之內，「四萬萬同胞」正是梁啟超念茲在茲全心所要召喚的中國現代國民的國族集體代號。

晚清以降運用「同胞」以界定國族成員彼此關係的論述，和所謂「黃帝為共同始祖」之說的興起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性。誠如沈松橋和周啟榮的研究所指出，晚清國族主義論述的一個特色，即是將

<sup>45</s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22。

<sup>46</sup> 梁啟超：〈變法通議〉，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52。

<sup>47</sup> 梁啟超：〈《清議報》·敘例〉，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168。

中國國族形塑為一個由血緣紐帶凝聚而成的親族團體，亦即一個擴大化的家族。<sup>48</sup> 換言之，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在以「黃帝始祖」的前提下，將能夠為家族／宗族之故不惜犧牲一切的「同胞之愛」的家族成員關係，擴大了「同胞」的原始意涵，進而將原本平鋪直敘式（甚至可謂是「冰冷的」數字表述）之國族共同體中的「四萬萬人」，轉為具有任何人為力量也無法加以切割和改變的血緣關係之「四萬萬同胞」。

此外，在梁啟超於1899年的〈尊皇論一：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一文中，他先以「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矣」破題，隨後描述在甲午之後憂國志士紛紛而起議論時政但莫衷一是，因為「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再以「同胞」和「國民」的字眼反覆訴求愛國心對於保國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光緒皇帝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後強調人人均需竭力急君父之難：「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sup>49</sup> 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在此文中，「四萬萬人」從過往主要是被談論如何運用或合群的人群，轉而為具有自覺意識且關懷國家大事，從事國政思維的現代國民（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而「同胞」、「吾國民」，和「四萬萬人」、「四萬萬同胞」可謂是彼此可互換的同位語，明確地成為梁啟超心中中國國族的代名詞。

梁啟超在其1899年所著之〈愛國論〉中，即明言「愛家之情」的親屬兄弟情誼之愛正是「愛國之心」的根本，而唯有將團結愛家之

<sup>48</sup>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尤其是頁31-35；Kai-wing Chow,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Frank Dikött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4-52.

<sup>49</sup> 梁啟超：〈尊皇論一：論保全中國非賴皇上不可〉，收於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2冊，頁519-522，引文參見頁519、522。

心化而為愛國之心才能真正發揮四萬萬人的集體力量：

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則不愛矣。……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愛其家者，蓋以為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隸則罕有真愛其家者，蓋以為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觀其國民之有愛國心與否，必當於其民之自居子弟歟自居奴隸歟驗之。凡國之起，未有不起於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國字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其意謂國即大家族，家族即小國也。君者，家長、族長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故西人以國為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則不然，有國者只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sup>50</sup>

梁啟超這一篇寫作於1899年的〈愛國論〉不僅是表述他對於現代國家和國民意識認知的重要代表著作，若以「四萬萬」人口符號在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變化而言，這一篇文章更是充分展現此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過程扮演的多重和重要角色，可謂是此符號意涵演變的一項重要里程碑。如果以音樂作品將之譬喻，將此文形容為「四萬萬」主題變奏曲亦不為過。它的幾項特色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分析：首先，在這一篇約九千字數充滿情感語調的文章中，梁啟超總共使用了11次和「四萬萬」相關的字眼（包含一次使用「我國岌岌四億之眾數，千年受治於民賊政體之下，如盲魚生長黑壑，出諸海而猶不能視」形容中國人口數）。<sup>51</sup> 在這些「四萬萬」的符號之中，有以「四萬萬人」

<sup>50</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72。

<sup>51</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

人口數形容中國的行文如「中國則不然，有國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sup>52</sup> 也有強調有如家族兄弟情誼的「四萬萬同胞」之符號，以及和清皇帝對稱時所使用的「萬萬同胞之臣民」，而出現次數最多（共5次）的則是語帶強烈感情的「我四萬萬同胞」。

其次，和其他過往論及「四萬萬人」的政論文章相較，梁啟超在本文透過運用「我四萬萬同胞」的符號不斷向讀者喊話，他將「自我」和「四萬萬同胞」相結合的「我四萬萬同胞」之「群我一體」表述方式，更是將強烈訴求個人和集體國族密不可分的相結合認同情感發揮地淋漓盡致。藉由這樣的行文方式，他傳達出一個強烈的訊息：「四萬萬人」不再僅僅是政論文章中有關中國人口數的描述，或是強調「合群」時是被言談的一個被動客體；相反地，每一位閱讀此篇文章的讀者，在閱讀的當下立即能意會到自己以及作者（梁啟超）和其他千千萬萬無數匿名的讀者，正是「我四萬萬同胞」所組成的「我族共同體」的每一個不可分割之成員，必須作為思考感受的主體，而共同與梁啟超一同來深自反躬自省何以「我四萬萬同胞」沒有愛國性質，沒有如西洋諸國之人有愛國意識，以致於被外人所譏笑。簡言之，梁啟超在讀者大眾已經相當熟悉的中國人口數字（四萬萬）的集體想像之認知基礎上，以「我四萬萬同胞」符號強調四萬萬成員彼此之間的血脈關係，形塑強化集體認同感，從而建構他心目中具有現代國民意識的中國國族。

此外，正如同 Benedict Anderson 所提示的國族想像論述的一大特色——國族雖是現代的產物，但是它總是被描繪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共同體<sup>53</sup>——在梁啟超筆下的「四萬萬同胞」已不再僅是十九世

---

冊，頁275。

<sup>52</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72。

<sup>53</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199-206.

紀時清中國所估算統轄的人口數（四萬萬人）的另一種稱謂而已；而是現代國族建構想像下具有共同歷史且同為血緣姻親的「我族」的具體稱謂。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梁啟超可以「很自然」地寫到「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sup>54</sup>而根本不會去質疑「四萬萬」的人口數，其實只是特定歷史時間點上的一個粗估人口數字，或是去自我質疑同胞之愛的國族想像本身也是現代思潮的產物。梁啟超此種召喚國族的用心在其的第一段即表露無遺：

泰西人之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渙散，其心耍懦，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貼耳相從；啖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蓋彼之視我四萬萬人，如無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議瓜分，逐逐思擇肉，以我人民為其圍下之隸。以我財產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為其版內之圖，揚言之於議院，勝說之於報館。視為固然，無所忌諱，詢其何故？則曰支那人不知愛國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sup>55</sup>

在全篇痛陳中國人甘為奴隸，無愛國心、不知國恥的論述中，梁啟超總共四度重覆了上述泰西人「曰支那人不知愛國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的結語（但在後續的3次覆述中，以「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取代「支那人不知愛國」的表述方式），包含在全文末段再以此段充滿感情的呼籲總結全文並和文章首段前後呼應。<sup>56</sup>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梁啟超以此主題不斷再現的說之以理和動之以情的論辯方式，透過「我四萬萬同胞」符號的聲聲

<sup>54</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70。

<sup>55</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70。

<sup>56</sup> 梁啟超：〈愛國論〉，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70、272、273、276。

召喚，使得「四萬萬同胞」成爲和「黃帝子孫」符號一樣，終於成爲在日後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國族想像認同的符號。

從歷史發展變化的角度而言，以「四萬萬人」爲基本形態的「四萬萬」人口論述想像符號家族，可以說從1898年後，正式增添了「四萬萬同胞」的新成員；自此而後，不論是康有爲或梁啓超，以及其他晚清思想家，例如上文提及的鄒容（1885-1905）等，均不時在其論述中援引「四萬萬同胞」以及「四萬萬人」等符號來召喚其心目中的中國國族。例如康有爲在他1899年訪問加拿大時所著的文章和演講中，即不時出現「中國四萬萬之人」、「黃帝子孫」、「我四萬萬同胞」等辭彙。<sup>57</sup>而梁啓超在其著名的〈瓜分危言〉中，首先分析當時西洋列強瓜分中國之迫切危機，雖然他憂心忡忡認爲此局面「決非數十年以前之可以優游幸度者，我四四萬萬同胞之國民，不知何以待之也」；但是在其論述如何能解除此危機時，他再度強調愛國心之起死回生之效：「我四萬萬同胞愛國之心團結之力是也。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之間，系茲一發。嗚呼！我同胞其念之哉。」<sup>58</sup>

在1899年間，梁啓超對於他所「新發現」的「四萬萬同胞」顯示出具有無比的信心和高度的期待。在同一年間他所著之〈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梁啓超首先表明此文一方面是應日本某政黨之機關報之邀而作，另一方面也是要「告我四萬萬同胞」。他在文中強調中國人種之將強之原因之一正是由於中國「人數眾多」。他很明確地指出：

中國人數眾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  
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

<sup>57</sup> 參見康有爲：〈游域多利溫哥華二埠記〉、〈域多利義學記〉、〈在烏威士晚士打1896埠演說〉，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上冊，頁398-407。

<sup>58</sup> 引文參見梁啓超：〈瓜分危言〉，收於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第1冊，頁294、298。



大勢，既日趨文明，即日趨於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制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插入於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場，迭相補助，然後畸輕畸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上之危險，乃可以免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源，而天運人事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sup>59</sup>

在此論述中，梁啟超關於中國人的集體論述，尤其是「人數眾多，耐勞苦而工價廉」的評斷，可謂和當時西方盛行之「黃禍論」中抵制華工輸入的論斷一致，而且更樂觀自信地認為全球經濟進步的關鍵，正在於中國的四百兆（四萬萬）人任勞吃苦的勞動力人口。<sup>60</sup>

另外，梁啟超在1902年關於他所揭櫫的「新史學」特色之討論，也是以促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為目的。對梁啟超而言，相對於有四大「弊病」（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舊史學，他所鼓吹倡導的「新史學」正是能夠「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之民族主義史學，模造所有「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的四萬萬之眾成為團結愛國血脈相連的同胞國民。

晚清的反滿革命論述也迅即援用「四萬萬人／同胞」的集體符號，打造其以漢族為中心的國族想像論述。鄒容在其著名的《革命軍》中，運用了「四萬萬同胞」、「神州四萬萬眾」、「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等符號描述其心中的中華國族共同體。<sup>61</sup> 他所謂的「四

<sup>59</sup>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261-262。

<sup>60</sup> 有關黃禍論在近代中西方論述中的各種意涵，參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頁69-108。

<sup>61</sup> 《革命軍》全文，參見鄒容：《革命軍》，收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

萬萬同胞」雖是以團結號召漢族（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起而投身革命排滿和康、梁的立場不同，但同樣是運用「四萬萬人」符號呼喚動員榮辱與共的集體情感。

孫中山（1866-1925）於晚清時期鼓吹革命之時，也不時以「四萬萬人／同胞」作為現代中國國族共同體的代稱。例如他在1905年於東京宣揚共和革命的必要性的一篇演說中，即一再以「四萬萬同胞」作為訴求：「若今日之中國，我們是萬不能安樂的，是一定要勞苦代我們四萬萬同胞追求共和幸福的」、「所以我們為志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兄弟願諸君救中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後禍」。<sup>62</sup> 當時這種以「四萬萬同胞子孫」字眼作為號召的訴求，已散見於在二十世紀初的各類型反滿革命的論述中，成為中國國族共同體的代名詞。刊行於1903年由匪石（1884-1959）所撰寫的〈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中，在哀痛中國自明滅亡後即淪為不堪之境的敘述中，即以感傷的語調痛陳：「所謂中國本部二萬萬面積之土地，乃為博物館歷史部之名詞，而所謂自黃帝以降所嫗育嬌愛四萬萬之子孫，乃為博覽會人類參考館之陳列品而奄奄以病！以群病！！以死！以群死亡！！……嗚呼！其能勿哭？其能勿哭？」<sup>63</sup> 另一方面，這種「四萬萬同胞」的共同體想像，不僅出現於革命宣傳或政治議論上，甚至消費市場的廣告上，都以其為號召對

---

（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頁108-140。

<sup>62</sup> 引文參見孫中山：〈救中國應改革舊制實行共和〉，收於黃彥編：《孫文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冊，頁154-155。

<sup>63</sup> 匪石：〈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收於羅家倫主編：《浙江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第2期，頁58。文中所提到的「博覽會人類參考館之陳列品」事件，乃是當時（1903年）造成日本中國留學生界騷動的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事件。有關此一事件和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之間關係的研究分析，參見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07-163。

象。例如標榜有強生功效的「養生液」廣告，即明言：「此藥一出，俾我四萬萬同胞服之，皆得盛其氣、旺其血，以強其種。汝見不數年後，不能於（與）白種人競爭此世界哉？此予之所厚望也」。<sup>64</sup> 這些例子都再再證明「四萬萬」的國族想像已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意識中，成為極其「自然」的現象。

此種集體訴求方式在日後更是屢見於近代中國召喚全體國民團結一致對外抗敵的文宣論述中，例如抗日時期著名的愛國歌曲〈黃河大合唱〉和〈長城謠〉的歌詞中，均很「自然」地以「四萬萬同胞」來訴求集體抗敵的團結情感。<sup>65</sup> 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一首流傳至今的〈抗敵歌〉的歌詞明顯地呈現出上述「四萬萬同胞」的符號魅力，以及它在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的重要地位：

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  
強虜入寇逞兇暴，快一致永久抵抗將仇報！  
家可破，國需保，身可殺，志不撓！  
一心一力團結牢，努力殺敵誓不饒。努力殺敵誓不饒！  
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  
文化疆土被焚焦，需奮起大眾合力將國保！

<sup>64</sup> 〈養生液系強種族之根本藥〉，《時報》，1907年11月29日。我要特別感謝上海復旦大學張仲民教授，他的著作讓我留意到這一方面史料的重要性。詳細討論參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sup>65</sup> 〈黃河〉的朗誦詞有如下的陳述：「啊，黃河！你記載著我們民族的年代，古往今來，在你的身邊興起了多少英雄豪傑！但是，你從不曾看見四萬萬同胞像今天這樣團結得如鋼似鐵；千百萬民族英雄，爲了保衛祖國灑盡他們的熱血；英雄的故事，像黃河怒濤，山嶽般地壯烈！」。此曲由光未然（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在1939年首演，爲中國最著名的抗日歌曲；〈長城謠〉的部分歌詞如下：「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少災殃。自從大難平地起，姦淫擄掠苦難當。苦難當，奔他方，骨肉離散父母喪，沒齒難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鄉，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敵人逞豪強。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這首歌是潘子農、劉雪庵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於上海創作的知名抗日歌曲。

血正沸，氣正豪，仇不報，恨不消！

群策群力團結牢，拼將頭顱爲國拋。拼將頭顱爲國拋！<sup>66</sup>

在這兩段訴求「四萬萬同胞」起而捍衛「中華錦繡江山」的簡短有力歌詞中，「家可破」、「身可殺」的警語，充分顯示出「同胞」的終極效忠對象是國家，而非原先界定「同胞」本意的家族／宗族。爲了保存「四萬萬同胞」的大家族（國家），個人的身家性命都是可以犧牲的代價。另一方面，這首不斷以外敵（日本）入侵來激發團體的高度危機意識的流行，似乎印證了 Freud（1856-1939）關於集體仇恨意識對於團結心理的必要性：“It is always possible to bind togethe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in love, so long as there are other people left over to receiv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ir aggressiveness.”（要將爲數可觀的人以愛團結在一起是永遠可能的，只要有另外一群人被用來承受前者們的侵略表現。）<sup>67</sup>

以上的種種論述例證都再再呈現了由「四萬萬」人口數字衍生而出的「四萬萬人」、「四萬萬同胞」等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我們再細究各種運用「四萬萬人」相關符號的論述，我們將會發現有關「四萬萬人／同胞」的種種論述想像，有兩項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力的思維邏輯特色必須先加以仔細釐清。首先，當「四萬萬人」不再僅僅是中國人口數字的表述，而是代表中國人民群體的代表符號時，它很容易形塑出一種高度同質性群體的假象。晚清強調萬眾一心團結合作的「合群」論述，本來就帶有強烈訴求「整體皆應如此」的全稱式思維傾向，因而經常呈現出全稱式的正反面極端對比的「四萬萬人」意象。具體而言之，這樣的應然訴求有時會投射出「整體已是如此」的表述方式，例如譚嗣同的「四萬萬人

<sup>66</sup> 此曲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由音樂家黃自譜曲，韋瀚章作詞，欲喚起人民抗敵愛國意志所作。

<sup>67</sup>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61.

齊淚下」意象，即是典型地將四萬萬人形塑為全都是關心國事而且因而會黯然神傷的仁人志士；同樣地，梁啟超殷殷期盼四萬萬人皆已在為國事憂心忡忡的理想，也投射在其筆下所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之情景。另一方面，相對於這種可謂是樂觀性思考的「整體已經如此」表述，另一種經常出現的情況乃是論者往往在應然和實然之間、期待和現實之間有高度落差的心理衝擊下，提出了「全體皆非如此」表述，例如在原先期待四萬萬人能合群的希望落空後，陳熾所描述的「天下四萬萬人各懷其私、各行其私、各是其私」的景象和鄭觀應的「中國上下四萬萬人群相見以偽」說法，即都是這種「整體皆非如此」的思維的典型產物；梁啟超筆下「以故為民四萬萬，則為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也是此種全稱否定論述模式的產物。

其次，伴隨上述這種可謂「全體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乃是另一種越來越傾向對於「四萬萬」符號所代表的群體，採取 (essentialist) 論述方式定位其所謂集體本質的論述模式。<sup>68</sup> 具體而言，即是將所謂「四萬萬人」視為是具有特定根深蒂固的特定性質，甚至是生理上之共同特徵的群體，並據此對其進行整體分析或批判。持平而論，在晚清探討關於中國何以無法團結一致萬眾一心的議論中，並非沒有出現將此萬眾無法團結的現象歸罪於外在制度的想法。例如前述康有為的〈請君合治滿漢不分折〉的中心論點即認為四萬萬之人之所以不能合群，其原因正在中國缺乏如西方之完善的政治制度。可是，有更多的論述在檢討四萬萬人不能合群的「病因」時，是轉而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四萬萬人本身所共有的基本特質，認為這些特定本質之有無

<sup>68</sup> 有關近代中國的本質性論述模式的討論分析可參見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in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105-128；關於此一課題的討論，可以以比較研究的角度參見 Pamela M. Allen 對印尼國族建構過程中的本質主義論述之分析，Pamela M. Allen, "Nationalism, Essentialism and the Yearning for National 'Wholeness': Post-colonial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in Indonesia," in *Asian Nationalism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oy Starrs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306-315.

正是一切政治社會問題弊病的根本來源。陳熾和鄭觀應直斥四萬萬人「各懷其私」或「以偽相見」的說法，可謂是在傳統道德模式下對於「四萬萬人」本質的集體道德指控；相對而言，梁啟超借西人之口所感嘆譏諷的「四萬萬人無愛國之性質」之說，則可謂是另一種立基於現代國民意識的對「四萬萬人」本質之集體批判。簡言之，這種以所謂「四萬萬人」共同的本質作為嚴厲批判之標的，將其視為中國何以無法脫離困境的根本原因的集體「四萬萬人」本質之論述，盛行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潮推崇所謂全體國民為國家真正的主體和主人翁之後的情況，可謂是一個相當反諷的歷史發展。<sup>69</sup>

職是之故，在上述可謂是「全稱式」和「本質主義式」的兩種思維模式的推波助瀾之下，「四萬萬人」或「四萬萬同胞」作為一種國族符號，無論其所形塑的面貌是正面或是負面，往往都是在召喚和形塑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國族共同體。例如當梁啟超大聲疾呼他心中理想的「四萬萬同胞」要共同學習本國史學時，他所要召喚的國族即可謂是「本質主義式」思維的產物。梁啟超在此處要召喚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由一種高貴的性質(愛國心／愛國意識)所界定，而這個國族認同價值位階是超越凌駕於任何各種社會性別區分團體(如老幼男女、智愚、賢不肖等)，所可能形塑的任何特定認同。這樣思維邏輯的一個可能發展即是以特定的所謂「根本特質」來界定國族認同，並特意忽視各個社會次級團體之間和乃至各個個體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刻意淡化各個社會次團體認同對於每一個不同個體的意義和重要性。此外，當在現實中這個具有所謂正向理想特質的高度同質性國族始終未能出現時，在前述「全稱式」思維的作用下，各種針

<sup>69</sup> 晚清以降的各類所謂「國民性」改造的議論基本上都不脫此種本質主義論述模式，而「四萬萬人」的符號也在這些論述中扮演顯明角色，文本以下在解析「奴隸性」和「病夫」說時將會對此現象有更清楚的解釋。有關「國民性」研究的反思分析著作，參見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9卷（1995年3月），頁68-79。

對所謂「四萬萬人本質」的全稱否定論述也就紛至沓來。這也正說明何以梁啟超一心要喚醒而且高度期待的具有「愛國性質」的「四萬萬同胞」，也在他後續的論述中，不時被他自己在痛心疾首的情況下所形塑的極為負面集體形象（例如下文將提及的「四萬萬禽獸」）所全面否定。這一類可謂同樣立基於「四萬萬」人口數字的負面共同體想像的形塑，也正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 三、少年中國 vs. 老大身軀

梁啟超在1902年時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國說〉，他以當時西方諸國已是「國民國家」(nation-state)之典範代表為標準，界定了當時的中國乃是處於「少年時期」：

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sup>70</sup>

梁啟超的說法反映了當時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近代國家意識」的覺醒，例如陳獨秀（1879-1942）也曾自我解析他自己是在八國聯軍之後才曉得：

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

<sup>70</sup>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410。

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我一個人如何能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這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sup>71</sup>

儘管梁啟超反覆宣揚中國是「少年國家」，我們卻可以看出他一再再地感到此「少年中國」和所謂「老大帝國」的刻板印象產生糾結不清的情況。一方面，從「近代國民意識」的標準而言，梁啟超一再以正向開朗的辭彙表達對於「少年中國」的高度期許；可是另一方面，梁啟超又以「夫以如此壯麗濃鬱、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的他者視角，自我質問何以中國會淪於列強眼中的老大腐朽之國呢？換言之，「少年中國」似乎始終無法擺脫「老大帝國」的陰影。為何會如此呢？關於此一問題，梁啟超在此篇文章中乃是以「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作為解答，認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並且以「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等，<sup>72</sup>來形容這些掌握國政權力之人的身心腐朽狀態，進而解釋當時中國何以既是「少年中國」（就國民意識而言），又是「老大帝國」（就國力衰敗而言）。

可是在梁啟超同年所發表的〈新民說〉中，梁啟超對於中國何以是衰敗的老大帝國的原因則有了相當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將責任僅僅歸咎於掌握國政權力之人的身心腐朽狀態，而是認為中國全體眾民皆有罪責：

<sup>71</sup>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7。

<sup>72</sup>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410-411。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者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蹠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sup>73</sup>

在此論述中，梁啟超眼中的老朽之人，已不再僅僅是當官執政者，而是他早在數年前即已常常論說的「中國四萬萬之眾」，和曾經寄與厚望的「四萬萬同胞」。<sup>74</sup>在此處關於四萬萬人的描述，和他前述〈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一文中關於中國人種的體格能力的正面評價可謂是有天壤之別。他先前所殷切期待的能夠承擔復國大任的「四萬萬同胞」，終究無法從「老大帝國」的各種生活積習、陋習中脫胎換骨，反而顯現出不忍卒睹的「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局面。

從思想發展的脈絡看來，梁啟超有關四萬萬人身體的極端負面評價，不管在內容上或是論述的手法上，都可謂承繼先前蔡鐸（1882-1916）和張之洞（1837-1909）的相關論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蔡鐸和張之洞的論述中，也都明顯地運用「四萬萬人」的符號來開展其論述。張之洞在1897年時即以反諷的語法，陳列各種不良行為（纏足、吸食鴉片）對於中國人體質的禍害，進而哀嘆「中國果真有

<sup>73</sup> 梁啟超：〈新民說〉，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713。

<sup>74</sup> 有關「病夫」意象在近代中西方論述中的各種意涵，參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17-67。

四萬萬人哉」：

今世士君子爲中國謀富彊、計安危者，會中國民數，率皆約四萬萬人。嗚乎，中國果有四萬萬人哉。山澤民數，陰陽不齊，以男女各半爲通率，禹瀕九州之內，自荒服狹鄉極貧下戶外，婦女無不纏足者，農工商賈畋漁轉移職事之業，不得執一焉。或坐而衣食，或爲刺暎玩好無益之事，即有職業者，尫弱頃側，跼蹐卻曲，不能植立，不任負載，不利走趨，所作之工，五不當一（機器紡織布局，司機者一人常管數機，須終日植立奔走，纏足者不能爲也；機器繅絲局其司盆者，亦須久立，纏足者亦不便），與刑而廢之，幽而禁之等。是此四萬萬人者，已二分去一，僅爲二萬萬人。男子二萬萬，其吸洋藥者，南北多寡相補，大率居半，又十分去五，僅爲一萬萬人。此一萬萬人中，其識字讀書有德慧術智者，十人中止二人，又十分去八，僅爲二千萬人。以中國幅員之廣，而所資以出地產，盡人巧，上明道術，下效職事，旁御外侮，其可用之民僅如此，裁足當日本之半，甚矣其危也。<sup>75</sup>

蔡鏗其1902年間所著的〈軍國民〉中，在有關「四萬萬人」體質的集體批判論述，他也是以「四萬萬人」作爲公分母，進而對於各類人群一一加以批判：

體魄之弱，至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埋頭窓下久事呻吟，龍鍾德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

<sup>75</sup> 張之洞對身體的主要批判內容，參見張之洞：〈戒纏足會章程敘〉，收於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第12冊，頁380。

中，復難保其人人孔物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鬥，亦將悉為所格殺矣。<sup>76</sup>

張之洞與蔡鍔有關「四萬萬人」身體的集體批判論述，雖然時間上相隔約有五年，但是不僅彼此批判內容大同小異，而且更重要是他們二者均以「四萬萬人」人口集體想像作為其論述的框架的起點，而且藉由一一削去各類人群的論述手法，達到了可謂是本質性論述的效果：四萬萬人表面上雖然似乎有性別、職業、年齡上種種類別上的差異性，但實質上卻是根本是幾乎沒有差異性的高度同質性（病弱身軀）之共同體。換言之，儘管他們所要強化的是一種集體負面形象，但同一時間他們的論證方式，也再一次地加深「四萬萬人」乃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群體的意象。

由此觀之，如同所謂「四萬萬個微生物」故事以及前述所謂「四萬萬人皆為病夫」的論述所昭示，「四萬萬」的人口數字也可以和相當負面的形象連結而形成負面的集體國族形象。然而有趣的是，如果說1906年「微生物」故事的負面比喻是外敵（日本人）的惡意產物，而且「微生物」尚且是現代生物醫學知識觀念架構下的產物（故事中所述這個比喻出自一位教衛生學的日本教官），所以讀者要能體會感受其負面的意涵，也還得要稍具現代科學的知識；但是一般廣大的讀者可能不熟知的是，其實在更早之時，中國思想界本身也早已出現以四萬萬負面意涵符號論述中國人集體形象的情況。除了上述的「病夫」形象外，梁啟超也在其著名的《新民說》之〈論權利思想〉一節中，即以他所理解羅馬法中奴隸等同禽獸的觀念，運用「四萬萬禽獸」的負面比喻，斥責中國人缺乏權利思想之現象。梁啟超在此文中首先論說禽獸僅知保全生命，而人類則有保全生命和保權利的兩種責任。因此人若是不知保全權利，則喪失了為人的資格「而與禽獸立於

<sup>76</sup> 蔡鍔：〈軍國民篇〉，收於梁啟超主編：《新民叢報》（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冊，頁341-342。

同等之地位」。他也因而以論理學（邏輯學）的論辯方式，支持羅馬法中視奴隸與禽獸等同的說法（「以論理學三段法演之，其式如下：無權利者禽獸也。奴隸者，無權利者也。故奴隸即禽獸也」）。基於如此的認知前提，梁做出了以下的結論：

吾見夫全地球千五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孟子有言：「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若取羅馬法之法理，而以論理解釋之，則豈惟近法而已？一國之大，而僅有四萬萬禽獸居焉，天下之可恥，孰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sup>77</sup>

梁啟超對於中國人不知權利思想之重要的現象，認為以孟子的「近於禽獸」尚不足以形容其可悲之狀，因而借羅馬法的說法，形塑出「四萬萬禽獸」的負面集體形象。由此可見，在晚清以降中國本身思想文化界內，以「四萬萬」符號召喚國族集體意識的論述也不乏特意強化的極端集體負面形象，藉而激發集體的自省甚或羞愧意識。例如麥孟華（1875-1915）在1900年時即痛言中國全國為「奴隸之國」——「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師教其徒、友教其朋，無不以奴隸為宗旨，——乃至舉其國為奴隸之國，而外人遂以有奴隸性質唾賤我四萬萬之人」——可謂是中國思想界中「四萬萬」負面國族符號的醒目代表。<sup>78</sup>

這種負面的「四萬萬人皆為奴隸」的論述想像，在章士釗（1881-1973）1903年發表的〈箴奴隸〉一文，更特別以醒目的可謂「四萬萬人分類表」的圖文並茂方式呈現。章士釗表面上洋洋灑灑地列出四萬萬人中各類不同的人群（男女性別項目的大分類下，又有各類如公私奴僕、官吏、兵勇等不同社會人群的分類），但實際上卻採用類

<sup>77</sup> 梁啟超：〈新民說〉，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671-675，引文參見頁671、675。

<sup>78</sup> 麥孟華有關四萬萬人皆為奴隸形象的論說，見氏著：〈說奴隸〉，《清議報》第69卷，光緒二十六年（1900）11月21日，頁1b。

似前述張之洞和蔡鐸的一一削去法論述策略，在仔細論證每一種人羣的實際的情況後，他得出一個反諷的結論：除了少數盜賊之外，中國舉國上下可謂無一不是奴隸。另一個頗具深意的對比是，章士釗也同樣和梁啟超一樣提到了羅馬法中視奴隸為禽獸之說法，但他悲觀地指出禽獸被侵侮後尚知起而作勢反抗，而中國人則根本不知起而抗爭，所以是「非禽非獸的奴隸」，是為「二十世紀之大怪物」。<sup>79</sup>由此觀之，章士釗此種說法和梁啟超的「四萬萬禽獸」之說雖然狀似相左，其實無非都是欲借極端負面集體形象來激發四萬萬人的集體恥辱感。此外，鄒容的《革命軍》雖然一方面推崇「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為具有高貴資質，擁有富豐資源的偉大種族；<sup>80</sup>但是另一方面也嚴厲地描繪「四萬萬人」為具有「奴隸之根性」之人（「中國黃龍旗之下，有一種若國民，非國民，若奴隸，非奴隸，雜糅不一，以組織成一大種。謂其為國民乎？吾敢謂群四萬萬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顏妾面。國民乎何有！」）。<sup>81</sup>

從以上的種種例證可以看出，這種以各類型負面集體形象激發國族意識的論述手法，可謂是由「四萬萬人」衍生之國族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發展上的另一項特色，同時也進一步地證明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四萬萬」的人口數字作為國族集體想像的代表符號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司空見慣的表述方式。這其中最為反諷的可能是張之洞有關「四萬萬人」字眼的運用，因為張之洞在反維新派人士眼中是被尊為正統的衛道之士。但從他也引用此字眼來進行其論述的情況看來，「四萬萬人」作為一種論述中國人口時的符號，已成為當時流行的趨勢。這個現象也正說明何以梁啟超在1902年時運

<sup>79</sup> 章士釗：〈箴奴隸〉，收於羅家倫主編：《國民日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1983年），頁6-26。有關「非禽非獸的奴隸」的論斷，參見頁19-20；「四萬萬人分類表」和其各類人羣分析，參見頁21-24。

<sup>80</sup> 鄒容：《革命軍》，收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140。

<sup>81</sup> 鄒容：《革命軍》，收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132-133。

用「四萬萬禽獸」之負面比喻時，他所需要為讀者解說和提示者的乃是羅馬法和孟子古典說法中有關「奴隸」和「禽獸」的出處來源，但是他卻可以毫不需要考慮到閱讀者可能會不了解「四萬萬」的指涉之意，而很「自然地」套用「四萬萬」符號和「禽獸」相結合，進而激發其讀者的集體羞恥意識——「天下之可恥，孰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

William A. Callahan 在討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特色時，以所謂“pessoptimist”一詞形容其經常呈現出的一種不穩定的兩極化的悲觀／樂觀、正面／負面態度和思維的共存或轉換之現象。<sup>82</sup> 從本文上述的研究也可看出，近代中國有關「四萬萬人」的各類論述，即反映出這兩種正反兩極相對立的面貌；關於它的高度同質性的想像有時指向正向，有時又是全然負面指向。從另一角度而言，兩極化的國族共同體想像現象，可謂反映了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說草創之際的兩種論述策略：一方面要將以各種新舊符號和歷史記憶，形塑成員之間的連結性及集體的光榮感；另一方面，則又往往藉由負面的集體形象或論述，以反向操作的方式，激發集體的受辱／受害意識，進而達成同仇敵愾的凝聚人心效果。而各種和所謂「四萬萬同胞」相關的國族人口論述，也正是在此種論述框架下呈現出其變動的意涵。換言之，正反面的集體形象儘管可能是尖銳對立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但是彼此都是立基於一種對於其所代表的群體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思維前提，無形之中共同強化了高度同質性國族的可能假象。但是在近代中國的國族想像過程中，也不乏有其他關於集體的想像符號，可以說從不同的層面挑戰「四萬萬人／同胞」所經常意指的高度同質性共同體形象，下文所討論的「一盤散沙」之喻和「五族共和」之說即是明顯的例子。

---

<sup>82</sup>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0.

#### 四、「一盤散沙」和「五族共和」

##### (一)、四萬萬同胞 vs. 一盤散沙

有關於近代中國人集體形象的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則是所謂「外國人都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說法。在臺灣的中小學課本中，關於此說法的介紹是援引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相關論述，因而大部分人均以「國父有如此之說」來連結所謂「一盤散沙」的集體中國人形象。所謂「一盤散沙」的比喻說法，事實上早在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時即已採用。<sup>83</sup> 例如康有為在1899年時即有以下論述：

凡中國之事敗於散而不聚、塞而不通、私而不公，若知其病，通之聚之公之，分則弱合則強。昔外人謂我一盤散沙，則我雖有四萬萬人，然省省不通不合不聚，府府縣縣不通不聚不聯，埠埠人人不聚不通不聯，雖有四萬萬人實一人。<sup>84</sup>

同樣地，梁啟超關於中國人無合群之力的評斷，也引用了所謂「一盤散沙」的說法。在其1900年所著之〈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中，他認為：

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群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

<sup>83</sup> 據日本學者藤井隆的研究，所謂西人譏笑中國人為一盤散沙之說，在西文的論述中並無確切文獻證據顯示有此一說。他指出甲午戰後《萬國公報》上刊有西人評論中國各地方不團結的評論意見，其中翻譯者自行增添的「如沙泥之四散」修辭即可能是一盤散沙之說的來源。詳細討論見藤井隆：〈「一盤散沙」の由来——広学会と戊戌変法運動〉，《現代中國》第82卷第14期（2008年9月），頁81-94。

<sup>84</sup> 康有為：〈在烏威士晚士打1896埠演說〉，收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頁406。

一盤散沙之謂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sup>85</sup>

在康、梁上述的相關論述中，二者雖然對於龐大的四萬萬之眾彼此之間，是否有所謂小群體（次團體）的連結性的評斷上有所差異，但若以國族的集體團結性而言，康、梁二者均持負面的看法，因而認同「一盤散沙」的形容之適切性。若從上一節中晚清有關合群的論述脈絡看來，「一盤散沙」說的出現可謂對應了晚清思想家長期以來所苦惱的四萬萬人不合群的批判（如前述陳熾和鄭觀應所持的負面看法）。而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的開宗明義之論斷，則是以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作為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的主因：

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祇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範圍。<sup>86</sup>

此處孫中山援引「一片散沙」的形象，強調中國人並沒有國族主義，但是他對於中國人可以為了家族和宗族之故，不惜任何代價的犧牲之描述，倒是和 B. Anderson 筆下描繪的國族認同之驅動力量有異曲同工之妙：“For so many millions of people, not so much to kill, as willingly to die for such limited imaginings.”（雖然沒有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去

<sup>85</sup> 梁啟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429。

<sup>86</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頁2。



屠殺別人，卻驅動同等的數量的人們，心甘情願爲此有限的想像〔指國族〕犧牲性命。) <sup>87</sup> 在〈民族主義〉的另一段落中，孫中山又再次引用「散沙」之形象，來定位「四萬萬人」之中國的真實狀況：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爲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sup>88</sup>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他於1924年的演講稿。雖然他和前引康、梁相關的「一盤散沙」說在時間上相距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之遙，可是三人對於中國人缺乏全體合群之意識的感嘆卻是如出一轍。就此而言，似乎從晚清以降關於合「四萬萬人」爲一體的「共同體」想像論述，所形塑之中國人集體認同的成效非常有限；至少從孫中山的眼中看來，距離 Anderson 所描繪的眾多國族成員樂於爲國犧牲的情景，在他所處的中國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可是弔詭的是，晚清以降的國族論述，或許未能如康、梁、孫所期待的迅速地發揮其打造國族一體的功效，卻可謂成功地挪用 (appropriate) 了孫中山所視爲具有局限性的次級團體（家族、宗族）意識的因素，亦即以所謂血親 (kinship) 關係的「同胞」概念，形塑界定近代中國國族成員之間的關係。時至今日，在中文語境中不論其論述者的政治意識形態

<sup>87</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7.

<sup>88</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6。

是傾向國民黨或是共產黨（甚至和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保持距離的民進黨），以所謂「同胞」之稱來界定國族成員關係的論述，幾乎可謂是理所當然之慣用手法。

在1939年7月7日，近代中國知名作家朱自清（1898-1948），在其紀念兩年前中國開始正式投入對日抗戰的文章〈這一天〉中，以充滿激情的筆調，描繪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情景：「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sup>89</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展望未來的短文中，朱自清運用了若干源自於晚清所流行之國族共同體想像符號（東亞病夫、睡獅、散沙），用以強調中國如何地脫胎換骨，即將從這些舊有負面形象蛻變為「新中國」。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這些國族符號，透過知名作家的召喚，再一次地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儘管在近代中國的公共意識和論述當中，這些符號幾乎都被視為是「外國人對中國／中國人羞辱的字眼」，但他們儼然已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論述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如同前述的〈抗敵歌〉所顯現出的情況，在朱自清的眼中，一個長期以來難以擺脫「一盤散沙」等負面形象的「病夫」國，終於在外敵入侵的危機意識刺激下，成為以「四萬萬同胞」為主人翁的「活中國」。

究竟植基於外敵入侵（真實或假想）的危機意識以及由其衍生而出的集體受害／受辱記憶，對於從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國國族集體意識的擴散和強化作用具有多大的效應，是一個需要更細密深入考察的歷史課題。然而，從上述的〈抗敵歌〉以及〈這一天〉所傳達的訊息，以及國共兩黨長期關注於抗日愛國宣傳教育和歷史記憶的灌輸（例如蔣總統的愛國抗日故事）的歷史發展看來，外敵危機意識（尤其是抗日的歷史記憶）的確對於所謂「四萬萬同胞」集體意識的深入人心有相當程度的強化作用。晚清激烈的反滿論述也是另一個鮮明的例證。

<sup>89</sup> 朱自清：〈這一天〉，收於朱喬森編：《朱自清文集2·散文卷II·生活旅情》（臺北：開今文化，1994年），頁209-210。

可是從另一角度而言，這個具有高度同質性意涵且常和「漢族」中心意識掛勾的「四萬萬同胞」集體形象，卻也為其他近代中國的論述想像，尤其是所謂五族共和說，形成了另一個難題。

## （二）四萬萬同胞 vs. 五族共和

經由強化外敵入侵的危機感以強化內部一體感的國族建構方式，可謂在近代中國國族以漢族為核心的國族意識即已佔有核心位置。在晚清時期，當黃帝從古代的帝王被重新詮釋為中國人之共同始祖時，此處的「中國人」並非意味著當時清帝國所統領下的所有人群，而是所謂的「漢族」或「漢種」。即使是強烈主張滿漢合作的梁啟超，也曾經以漢種，而非具有普遍意義的「國民」來定位「四萬萬同胞」的邊界，在他 1901 年所著的〈中國史敘論〉中，談及關於人種的分類時，儘管他對於漢族是否真的同出一祖（黃帝）有些保留的看法，可是卻斷言：「對於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sup>90</sup>

這種將「四萬萬同胞」僅僅限制在所謂漢種的說法，在反滿革命的論說中更是視為理所當然之事。例如鄒容在其《革命軍》中，一再強調漢族乃是「黃帝神明之子孫」和滿洲人絕無相干：「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這種以漢族為限來定位「同胞」的方式和上述梁啟超的說法並無不同。在《革命軍》中，「同胞」一詞充斥全文，鄒容並不時以「四萬萬同胞」號召漢人投入反滿革命（「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為同胞請命，為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最後更以「中華共和

<sup>90</sup> 梁啟超：〈中國史敘論〉，收於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451。

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作為總結語。<sup>91</sup>

在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以「五族共和」的論述企圖取代革命時期「反滿／仇滿」的漢族中心思想，例如作為共和國國旗的五色旗的符號意涵，即普遍被視為是此種新政治意識形態的展現，<sup>92</sup> 然而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論述，仍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就孫中山本身的態度而言，他即是表明反對以五色旗為國旗。孫中山在其1912年的〈臨時大總統宣言〉中明言：「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並以「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為結語。<sup>93</sup> 其中所謂「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語雖然將五族並列，似乎有共和平等之意，可是所謂「合諸族為一人」的意涵，卻是有以漢族為中心同化他族的思想。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即明白表示此種意圖：

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餘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

<sup>91</sup> 《革命軍》全文，詳見鄒容：《革命軍》，收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108-140。

<sup>92</sup>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

<sup>93</sup>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收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冊，頁1-3，引文參見頁2-3。

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sup>94</sup>

孫中山在此處所定位的「四萬萬人」是包含了漢族以外的其他族群（蒙、滿、回、藏共約一千餘萬人），這和上述梁啟超或鄒容以漢族為限所定位的「四萬萬同胞」之定義並不相同。可是，孫中山的此種定位方式，其實是含有「以大吃小」的企圖，尤其是其中所指稱「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餘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的話語，更是表明要以多數且同質的漢人，同化「不過一千餘萬人」的外來族群，從而形成所謂一個堅固之「中華民族」。<sup>95</sup>

本研究無意在此探究所謂「中華民族」的內涵和關於「五族共和」的各類論述。<sup>96</sup> 本研究感到興趣和好奇的是，長期作為「漢族」之「他者」(the other) 的其他各族，和所謂「四萬萬同胞」國族論述想像之間的微妙關係。沈松橋在評論晚清國族論述的局限性和其後遺症時，有以下之論斷：「民國之後，滿蒙回等少數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此起彼僕、繼踵而興，所謂『五族共和』蓋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從思想觀念上追本溯源，固然是直接受到晚清種族革命意識形態的激盪，而國民主義國族論述的內在局限，殆亦難其咎。」<sup>97</sup> 沈松橋此處所謂

<sup>94</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5-6。

<sup>95</sup> 有關孫中山對於「五族共和」論的高度保留態度的進一步探討，參見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社會科學》第5期（2004年9月），頁121-128；潘先林的研究即認為孫中山的「五族共和說」的實質上乃是主張民族同化，詳細討論見潘先林：〈試論『五族共和』思想〉，收於曾一士編：《第八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05年），頁99-130。

<sup>96</sup> 相關討論可參見黃興濤：〈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與確立的歷史考察〉，收於郭雙林等編：《中國近代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下冊，頁671-730。

<sup>97</sup>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73。

的「內在局限」，乃是指「在強調以政治聯繫為凝聚媒介的國民主義國族論述，依然潛藏著一套階序性 (hierarchical) 的種族論述」。<sup>98</sup> 換言之，以漢族為中心／為首的族群優越意識，始終是各類型國族想像論述的基底。

沈松橋上述的斷論，似乎也應驗在「四萬萬同胞」意涵的演變上。不論是在將非漢族排除在外（鄒容和梁啟超）的「四萬萬同胞」論述，或是在孫中山將非漢族納入其中的「四萬萬人之中國民族」論述，以漢族為中心的優越意識其實都潛藏在這表面上看似平凡不過的一個共同體的人口數字下。如果說，排他性的「四萬萬同胞」論述完全沒有容納其他族群的空間，但是孫中山的包納性「四萬萬人」論述也同樣地幾乎沒有多少容納其他族群的想像空間（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事實上，在《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孫中山關於非漢民族的部分，除了列舉上引的各族人口數外，幾乎沒有再有多少著墨。在孫中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想像中，在中國境內非漢民族可謂除了和漢族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者，並且漸漸被同化為漢族的一分子之途外，別無其他的選擇。

孫中山之所以對於漢族如何和非漢民族共組一個新的共和國的議題顯得興趣缺缺，實在源自於他真正的關懷（或是危機感）乃是在於所謂世界其他各國對於中國的人口壓迫問題（「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sup>99</sup> 如果我們細看〈民族主義〉關於世界各國局勢的分析描述，不難發現孫中山對於各國的人口數非常看重。他不僅詳列他所提各國（英、日、俄等）的人口數字，並且將各國人口數的多寡等同於各國國力的強弱。也正因如此，中國的「四萬萬人」一再出現在孫中山的論述中，不時和其他國家的人口數相對比，不斷提醒讀者中國所擁有的龐大之潛在國力。無怪乎，在〈民族主義〉的結語中，孫中山不忘再一次地對「四萬萬人」信心喊話：

<sup>98</sup>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73。

<sup>99</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52。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sup>100</sup>

## 五、近代中國國族的邊界與框架：四萬萬

當康有為在1888年上書給光緒皇帝時，他曾以「人民有四萬萬」的說法，鼓舞提醒年少的皇帝他統治下的中國乃是世界上人口數最龐大的國家。他當時念茲在茲的無非是大清帝國能在年少的光緒皇帝手上重振雄風永保國祚。但是20年過後，康有為一再寄與厚望的光緒皇帝在悲劇性的歷史情境下結束生命，而大清帝國也未幾即告終結而為中華民國所取而代之。從政治史而言，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君主立憲改革派終究不敵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而退出歷史舞臺。然而在這20年間，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扮演重要推手所催生的「四萬萬人／同胞」符號，儼然已演變為眾所皆知的中國國族代號。所以當孫中山在1912年以「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語句總結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時，也可謂正式宣告了這個以清帝國道光年間總人口為基底想像，並經過晚清思想論述孕育栽培而成的國族符號，不僅將不會隨著清帝國的消失走入歷史，反而將在這個標榜以「國民」為主的新時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種種例證也明確地顯示「四萬萬」的國族符號的確在近代中國的國族認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論是它是以經常被援引的「四萬萬人」和「四萬萬同胞」的面貌，或是以「四萬萬奴隸」、「四萬萬禽獸」或是「四萬萬微生蟲」負面形象出現，這些可謂是隸屬「四萬萬」符號家族的成員在近代中國的各類論述的盛行情況，正足

<sup>100</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75。

以證明「四萬萬」的國族想像長期以來已經很「自然」地嵌入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 (banal nationalism) 中。它從在晚清時期時尚是許多保守人士眼中的「幽渺怪僻之言」的「新名詞」，漸次演變成爲人人朗朗上口、「自然而然」地充斥於各類國族論述中關鍵詞的歷史發展，無疑是近代中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面向。

「四萬萬人／同胞」等相關符號，可以說是在十九世紀末因緣際會的歷史背景下，從一個源自於可謂是清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道光年間）的帝國總人口數字（四萬萬），漸次成爲晚清思想論述中經常出現的界定清帝國乃是萬國之中的「廣土眾民」之國的鮮明符號，隨後又成爲改革維新中議論合群和民權等議題的要角，最後更成爲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全體國民的同位語；尤其是極可能是由梁啟超所創發的「我四萬萬同胞」一詞，更是可謂成爲了近代中國國族 the national “we” 的重要代名詞。然而，在透過歷史的回顧分析並讚嘆其擁有的深遠影響力之餘，我們還是不禁要再追問，究竟它的巨大魅力從何而來？何以它能日久彌新持續成爲召喚國族的代表符號呢？

Anderson 在論及國族想像過程的若干面向時，特別提到了國族的人口數量想像上的「有限性」，他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族會想像有朝一日全人類會都是其國族的一員。除此之外，在關於人口的相關議題上，他認爲殖民政府時期的人口調查機制的族群分類範疇，以量化的方式形塑出各種「有限性」族群身分，成爲日後各種追求獨立建國的國族認同想像的依據。<sup>101</sup> Benedict Anderson 的這些關於人口想像和國族建構之間關聯的洞見，提供了我們進一步思考上述疑問的一些線索。

若純粹就嚴格的人口統計而言，「四萬萬」是一個非常不精準的數字，「四萬萬」的人口數字和實際的人口數並無明確可證的對應關係。但是重要的是，就國族建構想像的效應而言，「四萬萬」的數字所表明的全球獨一無二的巨大人口數量意象（薛福成、王韜，康有

---

<sup>101</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7: 163-170.



為、梁啟超等晚清思想家均強調此特點），不僅充分滿足近代國族論述想像中一再刻意要強調「我族獨一無二」的特色之需求，它更是一種 Anderson 所揭示的具有標示「有限性」之符號，成為近代中國從「天下體系」成為「國族國家」體系的一個成員的過程中，重新界定自我的重要指標。對外而言，它不僅標示著「中國人」（無論它包含中國境內漢族以外的民族與否）的和其他國族的邊界，界定了「全國人的大家」（借陳獨秀之語）和其他國家的界限；對內而言，它也形塑了一種高度同質化的族群成員之想像框架，如同孫中山筆下所描繪的「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

不斷出現在近代中國語境的「四萬萬人／同胞」符號，不僅除扮演了 Anderson 所謂的人口邊界限定的角色外，也長期代表著一種近代中國關於人口力量崇拜的符號（當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後，當龐大人口數被視為經濟成長的沉重包袱後，又是另外一種新的景象）。而且這種意味高度同質性的「四萬萬」共同體論述想像，也無形中強化了長期以來以漢族為中心的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例如上述孫中山關於全體中國人的描述，很難令人不將其聯想到那些被 Edward Said（1935-2003）所大加揶揄抨擊的東方主義者關於伊斯蘭文明之再現論述模式中所包含化約論述 (reductionism) 和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 的謬誤。然而無可否認地，正如本文中列舉的各類論述之例子所顯現，「四萬萬人／同胞」的符號想像力量，的確在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的運作過程中，可謂在大多數人不知不覺情況下發揮了巨大影響力，從而形塑了近代中國集體意識的特定風貌。而唯有去自然化 (denaturalize) 此現象並且歷史化 (historicize) 此一「四萬萬」共同體想像論述，詳細地考察檢視其歷史發展變化的軌跡，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了解近代中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且複雜的面向。

## 徵引書目

- 孔慶和、王冬立、張宇澄等編：《格致彙編》，南京：南京古舊書店，1992年。
- 毛思誠編，陳布雷校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收於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87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
- 王昇：《我們的蔣總統》，臺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6年。
- 古屋奎二：《蔣總統密錄》，臺北：中央日報，1974年。
- 朱喬森編：《朱自清文集2·散文卷II·生活旅情》，臺北：開今文化，1994年。
- 李敖主編：《譚嗣同全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3年。
- 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社會科學》第5期，2004年9月，頁121-128。
-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
- 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685-734。
-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2006年4月，頁40-53。
- 韋瀚章作詞，黃自譜作曲：〈抗敵歌〉，1931年。
-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孫中山：《三民主義》，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
- 國立編譯館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初級》修訂暫用本，臺北：國立編譯館，1956年。

- 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年。
-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黃河大合唱〉，1939年。
- 張岱年主編：《新政真詮：何啓、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張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頁1-66。
- 張肇祥：〈塑造與傳播：愛國反日的蔣介石同學〉，《國立板橋高中學報》第5期，2006年，頁175-183。
- 梁啓超主編：《新民叢報》，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冊。
- 梁啓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
- 黃彥編：《孫文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冊。
- 黃興濤：〈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與確立的歷史考察〉，收於郭雙林等編：《中國近代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下冊。
- 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2冊。
- 楚流等選注：《弢園文錄外編——王韜集》，瀋陽：遼寧出版社，1994年。
-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07-163。
-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 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 葛劍雄等著：《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一八五零年以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 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

- 版社，2008年，第12冊。
- 趙樹貴、曾麗雅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店，1997年。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冊。
- 潘子農作詞，劉雪庵作曲：〈長城謠〉，1937年。
-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9期，1995年3月，頁68-79。
- 潘先林：〈試論『五族共和』思想〉，收於曾一士編：《第八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05年，頁99-130。
- 鄭大華等選注：《貶舊危言——唐才常宋恕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
- 鄭觀應：《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 薛福成：《庸庵文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羅家倫主編：《浙江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
- 羅家倫主編：《國民日報彙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
- 藤井隆：〈「一盤散沙」の由來——広学会と戊戌変法運動〉，《現代中國》第82卷第14期，2008年9月，頁81-94。
- 蘇輿編：《翼教叢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 Allen, Pamela M. "Nationalism, Essentialism and the Yearning for National 'Wholeness': Post-colonial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in Indonesia." *Asian Nationalism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oy Starr.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306-315.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 Billing, Michael.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how Kai-wing. "Imagining Boundaries of Blood: Zhang Binglin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Han 'Race' in Moder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Frank Dikött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4-52.
- Dirlik, Ari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105-128
- Fogel, Joshua A. and Peter G.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M.E. Sharpe, 1997.
- Freud, Sigmun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acouperie, A. Terrien de.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 Early History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28 (1879: Nov. 21-1880: Nov. 12), 725-734.
- Moule, Arthur Evans. *Four Hundred Millions: Chapters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London: Seeley, Jackson, & Halliday, 1871.
- Smith, Arthu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walk: EastBridge, 2002.
- The Times*.